

## 「去中國性」：警醒、迷思及其他

——以王潤華和黃錦樹的相關論述為中心

◎ 朱崇科

一如「中國性」(Chineseness)自身發展的歷時性的五彩繽紛和永不終結，似乎有關「中國性」的論述也相應的蓬蓬勃勃、五光十色，當然，二者自然也並非不謀而合的永遠同步共振。「中國性」研究在今天似乎大有方興未艾之勢，開闊、精彩的創新及深層挖掘都可算綿延不絕，而且無論從研究路向，還是從論述的開拓性及深度上都可稱得上百花齊放、爭奇鬥妍：如王賡武對中國性發展及確立等的獨特洞察<sup>1</sup>或深入考察中國大陸政府與海外華人的互動<sup>2</sup>以及周蕾(Rey Chow)、吳燕和(David Yen-ho Wu)、洪美恩(Ien Ang)、陳奕麟(Allen Chun)對「中國性」的諸多角度、堪稱全面的破解與批評<sup>3</sup>都在在引人注目。同時，朱耀偉對「中國性」論述中中國語境下話語/權力關係與其特點的繁複梳理<sup>4</sup>也深入腠理，值得玩味。當然，不容忽略的還有黃錦樹的馬華文學語境下對中國性的剖析與糾謬<sup>5</sup>，筆者對此也有推進性的拙作<sup>6</sup>。

毋庸諱言，筆者的論述不應滿足於給這一抽象繁複的理論書寫領域添加更多的文字疊構，或只是盡我所能讓其更加糾纏不清；相反，筆者倒想擇其一條脈絡進行條分縷析：比如，對中國性的反動或稱之為「去中國性」(De-Chineseness)。當然，為避免落入宏大敘述的窠臼中給人以不知所云之感，筆者主要將之鎖定在新馬華文文學的大情境下進行觀照，力圖梳理以王潤華、黃錦樹相關論述為中心的警醒與迷思、睿智與不見，或許可以以小見大，破解其中的吊詭與幻魅。

### 一、被扭曲的「中國性」與本土迷思

眾說紛紜的中國性似乎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句俗套之語將它的可能性發揮到了極致，因為中國性實在是凝結了太多層面(次)的意義糾纏而且與時俱變。無論如何，不管是現實的中國，還是作為「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集體記憶，無論是旁觀者/外來人的日新月異、滄海桑田式的對這一概念的主觀理析與意義創構，還是親歷者對其指向抽象(曖昧?)相對客觀的逼切感受，中國性自然都表現出它或多或少、或急或緩的發展性。然而，不同地區和時空下，它也表現出了相當的差異性<sup>7</sup>。

陳奕麟甚至在不惜有些誇大中國性發展性的基礎上凸顯其中權力脈絡的宰制作用，「在我看來，『中國性』概念受其內在『缺席』(intrinsic absence)(就猶如被東方學權威否定)的折磨少於太多話語(內在/外在)在場(presence)的損傷。首先，指出中國性論述的歷時

性變化是可能的，它反映在從中國中心內核到民族國家的演變中，這些論述，作為地理位移（geographical removal）（如香港、海外）或者社會政治意義上的配置（sociopolitical disposition）（階級、社會性別）的一種功能與他們在不同華人社群中的構建方式截然不同。在種族特點（ethnicity）作為文化的話語層次上，有理由相信，恰是由於這些社群扎根於在地的具體的意義和權力的語境中，他們因而代表了不同的論域（discursive universe）」<sup>8</sup>顯然，論者的反本質主義立場和開放姿態很有啟發性。

而周蕾更是一針見血，矛頭直指中國中心主義（大中原心態），「在對『中國性』的慣常迷戀中，我們經常遭遇的是一種文化本質主義（Cultural essentialism）——在此個案中，大中原心態（Sino centrism）——在中國與世界的其他部分之間劃出了想象的疆界（imaginary boundary）」<sup>9</sup>。

誠然，「中國性」論述的差異性自然使得「中國性」更加五彩繽紛，甚至令人眼花繚亂，但實際上，在姿態各異的映照下，不得不強調的是，他們其實仍然擁有本質上的巨大交疊（交集），而中國本土的「中國性」無疑舉足輕重。

### (1) 去中國性：警醒與洞見

黃錦樹的「去中國性」論述仍然突兀的散布於其中國性論著中，在讓人觸目驚心的同時，也意味深長。

A 「去中國性」與「文」。黃錦樹對「文」的深刻認識與複雜處理凸顯出他去中國性的深層吊詭<sup>10</sup>：

要寫出典雅、精緻、凝鍊（疑為「煉」之誤）辭藻豐富的中文，無疑要向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吸取養分，深入中國古典文學。這一來同時導致文化、思想上的「中國化」，很可能會造成情感、行動上的「回流」，而認同中國……然而設使不深入中國傳統，又會受限於白話文本身存在的體質上的虛弱。深入傳統外，還需緊緊盯著海峽兩岸「新」文學的發展，吸收白話文在這兩個中國文化區的實驗。這種「關注」本身就含有比較的成份，無疑中國文化區的文學創作是相對的優越，因此「本土的文化傳統」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忽略輕視，而無法呈現一種血緣上的連續性。

對此吊詭，他本身也近乎束手無策，「由是，經典語言的建立，不能離於鄉土，也不能自外於中國文化。二者間如何取得平衡，也許，最終仍只能取決於作家本身。畢竟，每一位名作家都有一套屬於他個人的經典語言，是獨特風格之所寄，也為後人提供借鏡」<sup>11</sup>。

但對華文開放性的可能性的呼喚則體現了黃「去中國性」的良苦用心，為此他指責教條左翼「現實主義」語言哲學主導下文學的簡單操作與無知，「這種把語言看做是透明的工具性語言觀根本上否認語言除了指涉、傳訊之外還有其它的意義，而此種語言觀之下的語言操作者基本上並不具有語言自覺」<sup>12</sup>。無獨有偶，張錦忠也是非常決絕地堅持這一點<sup>13</sup>：

作為新興華文文學的馬華文學作者，有職責去尋找出和當代中國文學語言決裂的言說方式。這決裂的大前提是：華文不是中國的語文……海外的華文，總已是一種在地化的話語，一種道地海外的語文……換句話說，新興華文文學的華文是「異言華文」（Chinese of difference），另有一番文化符象，走的是異路歧途，文學表現也大異其趣，這樣的

新興文學才有其可觀之處。

林建國的論述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sup>14</sup>：

也惟其表義活動的可能，中國文字/符表的命運，才是一條或多條不斷生產論述和意識形態之旅；中國文字的命運便在它不斷遠離「源頭」，不斷指涉和進入與「源頭」不相同的歷史情境，陌生的歷史情境，甚至喪失中華性/中國性的歷史情境。

由是，我們不難看出黃錦樹等人的獨特用心：力圖在華文與中國文化的緊密粘連與結合中殺出一條血路，為馬華文學別緻文字的合法性/可能性作鋪墊。這種用心不可謂不良苦，甚至稱得上是獨具匠心。

與此相關的是，黃錦樹還點出了馬華文學中對他種語文書寫的兼容並蓄。他認為，「馬華文學的精彩之處或許並不在於它的本土性，而在於差異文化與個別經驗交揉出的多重性（猶如馬英文學）」<sup>15</sup>，順便提一句，黃錦樹對本土性的理解過於簡單，他此句判斷其實自相矛盾，我認為兩者其實是重合的，或者前者包含了後者。不僅如此，他還指出，「當前的馬華文學論著與認知都僅僅局限在『新』文學，以文言創作為媒介的仍還沒受到應有的重視」（似有回溯中國性之嫌），而且他還進一步推而廣之，指出「如果要想勾劃出大馬華人史上的文學全貌，則必須兼顧可能出現的這三種『華人文學』（華、巫、英，朱按），而華文文學只是其中一環」<sup>16</sup>。儘管其觀點不無商榷之處<sup>17</sup>，但是黃「去中國性」「文」中的封閉之良苦用心在在可見。

B「去中國性」之表演性。如人所論，黃錦樹敏銳（感？）的對中國性的警醒使人看到，「中國性的表現形態和敘述語言乃是中國文化象徵符碼系統的慣性運作，中國性並不只是文字技巧那般簡單，其中的中國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也扮演著決定性的作用：決定著馬來西亞的中國文學還是馬來西亞的華文/中文文學？……中國性令馬華作品失掉創造性，令馬華文學失掉主體性，成為在馬來西亞的中國文學的附屬，成為大中國文學中心的邊緣點綴。認清中國性所帶來的危機和障礙，迅速作出調整轉化，把毒瘤果斷的切除，無疑是所有馬華作家的重大任務」<sup>18</sup>。

毋庸諱言，黃對中國性的批判往往是不遺餘力的，也頗具針對性和殺傷力。「從結構的角度來看，大馬華裔知識份子對中國性的召喚固然可以說是特殊歷史情境激發下的產物，卻和晚清知識份子分享了同一個病理的結構，甚至可以說，就上述個案而言，回溯的通道在一再的強迫重覆中早已設定好，特定的歷史情境往往只是起著催發的作用」<sup>19</sup>。為此，近乎毫無保留熱烈擁抱中國性的溫任平式的「中國性現代主義」受到黃錦樹的迎頭痛擊似乎也就不足為奇了<sup>20</sup>。

特別耐人尋味的是，黃對中國性表演性的猛烈批評：他在非常警惕的擔憂中國性深度侵擾的同時，卻毫不留情的指出了大馬華文文學/化的限度：表演性。在他有名的代表論文〈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中的精妙論述在在表明，他不僅擔憂大馬中華文化承繼與發揚的簡單化危機，批評為傳承中華文化不惜急功近利、虛浮不實的實踐操作和為此可能的意識錯置，而且他還提醒大家毋陷入大馬中華文化危機與中國性一廂情願掛鉤的慌不擇路中，因而又遭受中國性的宰控。鑒於相關論述不少，此處不贅<sup>21</sup>。

引人注目的是，黃錦樹對對抗中國意識（僑民意識）的「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吊詭又矛盾認

知。一方面，他視之為馬華文學史脈絡的「分水嶺」，「之前是僑民文藝當道，蔚為主流，在意識上象徵了把南洋視為是中國的大後方，是中國地域的象徵延伸；論爭後來逐漸的扭轉了情勢，清算了文學上的中國意識，當地的地域意識及具本土色彩的文學開始建立起來」<sup>22</sup>，但同時他又不無吊詭的指出，「『馬華文藝的獨特性』的原始性格其實帶著濃重的宣傳色彩，是非文學的：被這種論述所制約的獨立後的馬華現實主義論述也全然無法脫離這種思考的格局」<sup>23</sup>。

不難看出，黃錦樹的「去中國性」其實帶著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和高揚的決絕精神（甚至成為一種非常反動的帶有政治意味的「反中國性」）。在這種高舉高打的背後也摻雜了他深刻的理性洞察與感性招搖。因是之故，他在「去中國性」的論述裏也難免有矯枉過正的偏見和一概而論式的盲視。

## (2) 本土迷思

A被扭曲的「中國性」。表面上看來，黃認為馬華文學的精彩之處或不在於本土性，恰恰相反，在我看來，黃的種種論述在在彰顯其深刻洞見的同時卻也暴露了其本土迷思。他甚至認為，「獨立後數十年的『馬華文學』創作，雖然陸續由本地出生的華人接手，卻由於語言的掌握本身，多少左右了他們的傾向，使得馬來西亞華人文學史上誕生的突破性原則『馬華文藝獨特性』無法積極的落實，構成了馬華文學的內在難題」<sup>24</sup>。

筆者認為，在黃對語言（華文）書寫可能性的開拓在對馬華文學的提升不無裨益以外，也須要注意和防範矯枉過正的惡果。我擔心的是，對華文的過度開發乃至施暴也包含將馬華文學書寫變成自戀式的喃喃自語或痴人說夢的可能性。因為如果頻頻割裂文字與文化的密切聯繫，完全導致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的斷裂，這種惡果的出現絕非杞人憂天，而是指日可待。這種過度拆解其實是從老現們對文字作為透明工具使用的一個極端反撥到了另一個玩弄甚至製造文字的另一個極端。

林建國同樣企圖彰顯馬華文學的自主性，甚至主張從源頭開始清算，「馬華文學的發生，不能只從中國文學的影響的角度看待，也須從中國以外被殖民的第三世界角度審視。因此與其認為『南洋色彩』的提倡是中國作家反侵略情緒在南洋的移位（displacement），不如說是殖民勢力下可以理解的姿態」<sup>25</sup>。林的見解無疑新人耳目，但他的推、拒姿態恰恰表現了他闡釋馬華文學的焦慮（anxiety）。他的這種心態在如下的論述中可謂昭然若揭，「掌握『南洋』的歷史，特別是大馬（華人）的歷史，是擴大原有視野的唯一辦法。也是在這新的詮釋視野之下，黃錦樹更動了馬華文學的定義。這動作有深層的政治意涵，宣示馬華文學從此成為中國文學詮釋視野不能捕抓的他者，宣示馬華文學源於大馬歷史，屬於大馬文學」<sup>26</sup>。

誠然，力圖將馬華文學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原本合情合理，而且馬華文學的獨立和繁榮只會更加豐富華文文學書寫。但對中國性的扭曲卻反映了二元對立思維在作祟。必須明瞭的是，選擇以華文書寫，其實就意味著與中國性的永恒纏繞，反中國性其實更指向文字中部分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權力話語限囿。問題的關鍵在於：何謂「馬華文學」？其上限起自何時？

張錦忠就堅持將馬來西亞建國前的華文文學排除在馬華文學之外，「客觀地說，在馬來亞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之前，南洋華人身份不明，沒有馬華文學，只有海峽殖民地或各馬來亞聯邦的華文白話或文言文書寫活動。這些（延異的）書寫活動，既是中國作家創作活動的延

續，也是馬華文學的試寫或準備」<sup>27</sup>。荒誕的是，照其邏輯，將戰前新馬華文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支流似也理所當然/名正言順，吊詭的是，這恰恰又是黃錦樹、林建國所深惡痛絕的中國中心觀的表現。

黃錦樹將戰前馬華文學指斥為「外來文學」或「僑民文藝」<sup>28</sup>，而且他的小說「經常探討早期華人在馬來半島的歷史，他認為，『華人的經驗是全新的歷史經驗，新的實在（reality），寫作必須以它為主題而不是以中國性為主題』」<sup>29</sup>。倘如此，黃的去中國性對象和命名似乎應該有所修正。

如果清理中國性的相關論述，便不難發現，如此五花八門的理論堆積恰恰源於論述作者自身的邊緣立場或「外位性」（巴赫金〔M. M. Bakhtin〕語），更確切一點，「中國性」的諸多闡述恰恰是中國本土以外對其主體缺失的文字補償，而在本土的中國（人）似乎在牢牢佔有這種豐盈特質後而顯得心安理得，而因此讓這種命名/論述銷聲匿跡；即使有，也往往另名稱之，而且內涵特徵與前者大不相同。以國學大師梁啟超為例，他認為「國性」指的是一個民族賴以自立於世間的本性，「苟本無國性者，則自始不能以立國。國性未成熟具足，雖立焉而國不固。立國以後而國性流轉喪失，則國亡矣」<sup>30</sup>。儘管梁認為「國性」的源頭/緣由和產生難以確定，其所指也無具體指向，但他仍點出了「國性」的大致包含，「就其具象的事項而言，具體的不可指，具象的略可指。則一曰國語，二曰國教，三曰國俗，三者合而國性彷彿可得見矣」<sup>31</sup>。顯然，梁啟超對「國性」的理解與今人所言的「中國性」不盡相同。作為一個中國人，他的立場和關注焦點也因此而異。

我們必須明瞭的是，大馬未立國以前，其華人仍然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無論是其物質身份，還是精神指向都無一例外的屬於中國迷戀（obsession with China），在此時段的文學發展過程中，現代性和本土化運動往往舉步維艱<sup>32</sup>。毋庸諱言，黃錦樹的「中國性」在指向他們（南洋中國人，儘管這些中國人有時也包含了強烈的在地的激情），無疑顯得不倫不類，而且去中國性的對象如果包含了他們的書寫時，顯然「去」的沒有道理，其可行性/適用性無疑會大打折扣<sup>33</sup>。

如果以「中國性」一統江湖，而又將「戰前馬華文學」排斥在馬華文學之外的話，這種欲迎還拒的姿態無疑也反映了處理方法的吊詭和尷尬。

B作為對策之一的「中國情結」。相比較而言，林春美的處理無疑勝過黃一籌：以「中國情結」命名之並且實現了善始善終的一貫性，「『中國情結』存在於馬華文學作品之中不僅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而且早自馬華文學形成之初就是『已然』的一種心態。獨立前的『僑民文學』時期與獨立後溫瑞安等人在台灣創辦的『神州詩社』時期，可說是這種現象與心態最為昂揚的兩個階段」<sup>34</sup>。

難能可貴的是，林還一掃之前「中國性」論者的含混不清或自以為不證自明，她指出，「中國情結」是指「糾纏在作家心靈深處、對中國的情感，以及受到作家高度重視的有關中國的觀念。這些情感與觀念，可以是民族身份上的，文化屬性上的，歷史上的，甚至是地理上的」。她還將「中國情結」投射的幾個層面一一列出：1文化的鄉愁；2對傳統的孺慕、對五千年文化歷史的自豪；3對異族文化與宗教的排斥，反感與恐懼；4回歸意識等<sup>35</sup>。

對「中國情結」與其他維度/概念的複雜關係，林也有所覺察，她也並沒有對之一概加以排斥

和消解，「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情結並不一定就是『馬華情結』的對立面，也未必一定與『本土意識』相衝突」<sup>36</sup>。

當然，「中國情結」對大馬立國前的馬華文學中的中國意識等的總結也只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其他可能更為適合的命名期待有心者的積極參與。

小結：「去中國性」的論述在黃錦樹等人的手中似乎因了本土意識的彰顯而顯得新穎別緻又朝氣蓬勃，自然可以時時發人深省。吊詭的問題亦在於，他們「去中國性」的過於急切和功利偏頗心態反倒完成了對中國性的扭曲：無論是對中國性自身的涵蓋，還是對它與他度路徑的複雜糾葛的處理都失之簡單，乃至走向自相矛盾的極端。

## 二、王潤華：後殖民視角與錯置的「去中國性」

作為留台生的精英份子，在台灣的林建國、黃錦樹和張錦忠等人對馬華文學的歷史、現在乃至將來的發展仍可謂念茲在茲。林在反思馬華文學的論述時，曾經慨嘆，「後殖民論述一點都用不上」。黃則認為「馬來西亞華人的複雜身份/馬華文學的複雜性，早已（早該）是後殖民的議題。後殖民論述提供了理論的資源及大量的個案供參照，馬華文學是現成、有待開發的反思場域」<sup>37</sup>。

饒有意味的是，王潤華著述的《華文後殖民文學——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的問世無疑避免了讓這種慨嘆化為永遠的空悲切的神傷，因為，至少它是「第一本研究世界華文後殖民文學的重要著作」（該書內容簡介）。

### (1) 新知與洞察

某種意義上講，後殖民視角毋寧體現了論者主體性或文學認知本土意識的張揚，同時吊詭的也是對自身或在地文學主體缺失的尷尬的深入洞察。比如黃錦樹在檢視馬華現實主義框架下的馬華特性時就順帶凸現了後殖民視角，「這種規定有它的策略性，曾經具有相當的戰鬥性，作為一種武器足以在意識上對抗殖民帝國主義及老中國情懷，然而在馬華本土它早已在重重艱難的處境中衰疲了，衰疲為一種既不介入也不反映現實、和書寫主體之間又切割得過於乾淨的關係的一種無法再現任何事物——再現的總是無物——內容與形式被雙重取消的書寫程式，因此意識的困境物質化為手的困境」<sup>38</sup>。當然，此處他的批判對象指向的是大多亦步亦趨中國現實主義，最後難逃其遮蔽的馬華特性。

王潤華以後殖民視角審察新馬華文文學是一個有意為之的大範圍、大手筆的解構：無論是別出心裁解讀1920-1930年代老舍《小坡的生日》對新加坡的後殖民寓言以及老舍以此本土意識反抗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的文化優越感<sup>39</sup>，還是解讀魚尾獅作為新加坡文化困境象徵的後殖民意象；無論是解讀吃榴槤的神話還是閱讀吳岸詩中的後殖民樹木；無論是重省魯迅對新馬後殖民文學的悖論式角色轉換，還是以報紙副刊反思方寸之間的後殖民貫注都在在體現了王對後殖民視角使用的自覺和得心應手。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操作決不只是技術意義上的花樣翻新，而更多是反彈琵琶、新意迭出；在後殖民視角的關注下，固有的諸多成見轟然坍塌，而被壓抑的本土性/現代性則紛至沓來。

具體說來，王從文本詮釋（對傳統文本、思想、文本的深刻解讀）、意象挖掘、敘事營構、

邊緣解構等策略體現了他後殖民理論的貫穿，同時他新馬本土視角（新加坡情境、新加坡立場、新馬特色等）的使用又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五光十色的文字論述空間，「後殖民理論在王的手中宛若點石成金的魔指，開闢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世界：其眾聲喧嘩中體現出理論的井然令人覺得『萬變不離其宗』，而後殖民理論運用層次的光怪陸離卻又讓人看出王對世界華文文學後殖民視角批評實踐的苦心孤詣」<sup>40</sup>。

儘管這些視角在具體操作時可能也有不周延之處（容後再述），但對不同文化霸權的深刻批判則顯現了論者上升的本土意識（覺醒）和在邊緣建構多元文化中心的深層焦慮，「當五四新文學為中心的文學觀成為殖民文化的主導思潮，只有被來自中國中心的文學觀所認同的生活經驗或文學技巧影式，才能被人接受，因此不少新馬寫作人，從戰前到戰後，一直到今天，受困於模仿與學習某些五四新文學的經典作品。來自中心的真確性（authenticity）拒絕本土作家去尋找新題材、新形式，因此不少被迫去寫遠離新馬殖民地的生活經驗」<sup>41</sup>。

儘管當時馬來亞作家書寫中國或中國式書寫有他們感時憂國與向往中心的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但往常論述中他們被壓迫與遮蔽的一面往往被論者所忽略，而王卻成功的使之重見天日。

## （2）錯置的「去中國性」

A移民文學在後殖民語境中的誤讀。王潤華很銳利的指出，「新馬的華文文學，作為一種後殖民文學，它具有入侵殖民地與移民殖民地的兩種後殖民文學的特性」，又言，「這種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它所設置的經典作家及其作品規範，從殖民時期到今天，繼續影響著本土文學。魯迅便是這樣的一種霸權文化」<sup>42</sup>。某種意義上講，宣示雙重霸權文化傳統對新馬華文文學的壓迫是王潤華的深刻創見，同時，將中國文學/化視為獨立後新馬華文文學/化的霸權文化有其可以深深理解的一面，比如中國學者大中原心態的壓迫性敘述。但若同樣以此套至戰前新馬華文文學，則可能更多完成了對去中國性的極大錯置，而同時暴露出後殖民視角的偏頗。

楊乃喬指出，長期以來，大家對「殖民」的意義往往有誤讀之處，他指出，「『殖民』是一個時空意義上遠遠先於『殖民主義』的純粹技術性概念，早期的『殖民』也僅是在『移民』（emigration）的純粹技術內涵下成立自己的中性意義，正如美國學者H.L. 威斯林所承認的：『殖民是一個技術術語，在原初意義上，僅僅用於描述人們遷移到世界其他地方並在那裏展開新的定居生活的現象』」<sup>43</sup>。

對殖民將錯就錯式的誤讀使得它在後殖民概念中已經成為一種宗主國文化對臣屬殖民地的巨大壓迫感。但當我們將這種概念轉向中國文學之於獨立前的新馬華文文學時，後殖民的文化霸權稱謂其實是對「去中國性」的錯置，實際上新馬華文文學更接近「在某種中性或保守的意義上稱其為『移民文學』」<sup>44</sup>。

可以理解的是，在當時對這些華文作者政治身份與文化認同皆遙指中國中心的移民（移民時間有先後的中國人）來說，他們在馬來亞書寫中國、心繫中國更多是一種心甘情願和主動選擇，以後殖民話語考量他們確實有些擴大化。所以當時的新馬華文文學更應該是「移民文學」，中國文學/化對他們和本土的中國人是相對平等的文化汲取資源，中國從未在此時對他們充當文化殖民者的角色，因為他們本身仍是中國人，只是可能更多了一些對在地人、事、

土地等或強或弱的認同，同時對中華文化的接受與繼承方式/途徑稍稍異於母體中國。新馬獨立後，中國文學/化也並未主動施展她的文學/文化的強迫/霸權功能，新馬華文文學的中國性更多是內外勢力打壓之下（如政府、異族文化等）一種迫不得已面向文化母體尋求動力/支撐的主動找尋。

B「內部殖民」。英國學者穆爾-吉爾伯特（B. J. Moore-Gilbert）認為，「與後殖民批評有關的視點和方法還愈來愈多地被用來說明『發達』世界內部的民族國家中『內部殖民化』文化的歷史和困境。比如以英國為例，邁克爾·赫克特寫的《內部殖民主義》（1975）一書開創了一個新的分析階段，強調一直存在著一種基本是（新）殖民的臣屬關係，蘇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是『邊緣』民族，英格蘭是『中心』」<sup>45</sup>。筆者在借用「內部殖民」這個詞主要想說明王潤華所指的中國文學/文化的霸權/殖民者角色的形成，更多是新馬歷史情境下「內部殖民」（即新馬華人/文化人內部一部分人憑借諸多偉大人物/思想/強勢文化等手段對另一部分人的自我殖民、人為殖民）的產物，而與缺席的無辜的中國文學/文化關係不大。

我們不妨以王著名的《從反殖民者到殖民者：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為例來梳理「內部殖民」的實際操作過程。王潤華對其中的操作與心機的認識不乏洞見，甚至某種程度上看，可謂深諳其道，「新馬當年的華人移民，因為要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侵略，力圖以民族主義為基礎來抵抗殖民文化，結果中國文化所建立的威力，最後對落地生根的華人來說，也變成一種殖民的霸權文化」<sup>46</sup>。吊詭的是，王恰恰在此處回避了新馬華人自己不可回避的對責任的主要承擔，是他們當年功利性借用中華文化，在建國後唯恐避之不及卻難以擺脫/洗清，於是其他名實開脫。退一步講，如果中華文化可被稱為「殖民霸權文化」的話（實則在新馬立國前這種稱謂不無問題），當年的新馬華人自己應當自食其果，並勇於承擔。

考察其具體操作的進程，如果說魯迅1930年後的聲望「主要不是依靠對他的文學的閱讀所產生的文學影響，而是歸功於移居新馬的受左派影響的中國作家與文化人所替他做的非文學性宣傳」<sup>47</sup>得以鵲起的話，作為中國移民的文化人宣揚魯迅，擴大他在新馬華人中的影響並推波助瀾自然也無可厚非。如果說紀念魯迅逝世活動在新馬營造了魯迅神話的話，「這些活動成功的把魯迅崇拜變成以新馬為重心的戰鬥精神，要利用魯迅的神話來實現本地的左派，甚至共產黨的政治目標：推翻英殖民地，建立馬來共和國服務」<sup>48</sup>。由上可見，魯迅仍然是被在地的華人功利性的借用為鬥爭工具和精神凝聚力的象徵。

到了最後，仍不乏類似言論，到了50、60年代，方修則成為重視捍衛魯迅的代表人物，甚至到了70年代韓山元還是「新馬推崇與發揚魯迅精神的代言人」。為此，王潤華慨嘆道，「從韓山元的這個例子，令人心服口服的說明殖民的霸權文化即使在殖民主義遠去後，其文化霸權下所發揮的影響力，還是強大無比。韓山元本地出生，其家族早已落地生根，但中國的優勢文化，還是抵制住本土文化之成長」<sup>49</sup>。

筆者以為，這個結論恰恰說明王潤華「去中國性」的錯置。通過以上的分析不難發現，作為優秀作家的魯迅在新馬的「精變」（不斷變換）如果可以算得上從一個反殖民者成為一個殖民者的吊詭轉換的話，這個歷程的始作俑者和責任承擔者自始至終都和在地的新馬華人自己密不可分。魯迅宛如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死後哪怕在九泉之下都難以想象的南洋遭遇卻在在見證了早期新馬華文學中「內部殖民化」的複雜歷程。王潤華「從反殖民者到殖民者」的命名中其實掩蓋或卸去了在地華人的人為操作，同時也是對去中國性部分的誤讀和過度反撥之後的身份錯置。

小結：以後殖民視角反觀新馬華文文學乃至世界華文文學自然有其鮮明的特色和很大程度上/範圍的可適用性，但同時必須小心的是，稍有不慎，如果忽略了後殖民理論自身的適用性，它極可能變成一種事後諸葛亮式的洋洋自得，甚至對諸多文化觀念的誤讀或者去中國性的錯置。在我看來，魯迅在新馬被視為「殖民霸權文化」資源似乎對去世60餘年的魯迅不公。相反，「他依舊是，也更應該是反殖民的英雄，依舊可以充當新馬文學騰飛的資源支持。問題的關鍵在於：新馬華文文學在創造的前序中必須『收縮自如』，你如何鑽進去，又如何跳出來？」<sup>50</sup>

### 三、反思：「反中國性」、「去中國性」還是「立中國性」？

毋庸諱言，如前所論，「中國性」命題毋寧顯示了身處邊緣或異境的主體闡釋自我身份的焦慮，當然也可能表現了西方漢學家對「凝固中國」的一種固態迷戀<sup>51</sup>。對於中國本土自身，往往缺乏對這種命題呼喚與激烈討論的熱情，往往中國人以為自己、實際上也佔有了最豐富多彩的「中國性」而顯得自信十足。如詩人孫文波就認為，「我們從自己的生活中導出的一切關於生活的認識、反映和態度，就是『中國性』，我們的一切活動都來自於它。不管別人的看法如何，不管別人認為這樣中國不中國，我們可以說，這就是中國。我相信，我們有權利這樣說。」<sup>52</sup>他的話無疑反證了轟轟烈烈糾纏於中國性的論述者的焦慮和主體缺失。

發展的「中國性」。必須加以強調的是，「中國性」是一個發展的概念/實體，吊詭的是，它自身並非如許多人臆想的是靠自身的分裂/增生而不斷累積的，相反，它也是在兼容並蓄、容納百家、有機融合的基礎上形構的。從理論上講，它甚至也包含了吸收馬華文學中所創建的成熟的中國性的可能性。如果我們借用這個詞來以西方漢學（或邊緣）的角度考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中國性」的流變時，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性」在華洋雜處基礎上的巨大包容性和混雜（hybridism）。如果我們能夠以魯迅為鏡鑒，從他的身上也許可以或多或少看到，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性』的確不是像有些人以為的那樣，是通過對表面的東西的強調來確立的。如果僅僅是看表面，那麼二十世紀幾乎沒有一個從事中國文學創作的人，可以被認定為具有『中國性』，像寫詩的穆旦、馮至、卞之琳，寫小說的沈從文、巴金，他們沒有一個不是接受了外來文學的影響，從中汲取了養料的。」<sup>53</sup>由此可見，如果我們以一種平和心態看待「中國性」，它應當是一個中性名詞，而非今日聲名狼藉、情緒宣泄的替罪羊。

「反中國性」=「去中國性」？如前所論，在馬華文學的語境下展開對過於強勢的中國性的一種反抗和抵制是一件合情合理的實踐操作，尤其在本土意識覺醒、騰漲的情況下，有利於趁機為確立馬華文學的主體性鼓吹、造勢打好基礎，乃至勾勒雛形。但其中吊詭的是，不能將中國性視為十惡不赦的仇敵，否則很容易在心理失衡的情況下完成對中國性的過度扭曲或去中國性的錯置，黃錦樹等人和王潤華都因本土性的龐然崛起而對去中國性產生了誤讀（有意的？無意的？）。

需要明瞭的是，馬華文學選擇華文作為文學書寫的工具和載體，就意味著中國性的不可離棄，相反，中國性早已深深的內化於華文/文化中。儘管從中文到華文的演變可能包含了語言開拓、沖淡中國性的微妙無形空間，但實際上這個空間並不能無限拓延，因為走到了極端，就是固步自封式的自言自語與自取滅亡。從此意義上講，作為政治上和態度上都過於決絕的「反中國性」更多是一種痴心妄想，就好比站在地球上遭遇地球萬有引力的人，企圖自己拔著自己的頭髮逃離地球一樣荒誕，而「反中國性」本身其實包含了將中國性妖魔化的傾向，

「去中國性」並不同於「反中國性」。前者是對龐雜中國性鋪天蓋地侵襲／佔有的一種警醒式姿態，而後者則是對中國性決絕的斬草除根，恰恰又犯了孩子與髒水一起潑出去的因噎廢食式的謬誤。

「立中國性」。如果我們承認中國性是新馬華文文學難以擺脫的內在精魂，我們就應當以積極的心態勇於面對。除了小心翼翼又虛心汲取中國文學／文化博大精深的動力支持與豐富的精神資源外，我們也應當有信心「立中國性」，即創立有機融合於「馬華性」中的獨特中國性。首先，「中國性」作為一個不斷發展和具有巨大包容性的實體本身為立中國性提供了創造／豐富它的可能性。其次，新馬華文文學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華、結合在地思考的情況下有可能創造出新穎、獨特對中國的「中國性」具有互補價值的別緻「中國性」（內涵於馬華文學／文化的本土性中）。第三，立中國性恰恰是和中國本土實現直接對話／交流的一種有效方式和檢視馬華文學／文化主體性成熟與否的手段。

須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們在檢討「去中國性」的動機／目的，可能有人會以多元文化中心或「多元共生論」作為潛在／明確的奮鬥目標，但其中可能仍然包含了此中心（小中心？）成為襯托彼中心（大中心？）的綠葉／紅花的邏輯陷阱。如人所論，「少數族話語同樣必須警惕『多元共生論』（pluralism）……從外觀上看，只有那些已經吸收了主流文化的人們才欣賞多元共生論，這一假象掩蓋了主流文化永遠不變的排他性。對於這種多元共生論來說，種族差異或文化差異只不過是一種異域情調，是一種可供細細品味的特殊享受，同時，又對已牢固地扎根於主流文化思想保護體的具體個人，沒有甚麼實質性的影響」<sup>54</sup>。儘管上述論點並未與中國／馬華文學的複雜關係一一對應，但個中陷阱卻不可不防。

由上可見，「去中國性」其實也糾纏了斬不斷理還亂的千頭萬緒式的挑戰、機遇與陷阱，我們須要小心翼翼與心平氣和，但同時，這種變幻莫測、曲折纏繞也是它散發迷人魅力之處，它仍然一如既往會對那些富有挑戰精神、胸懷智慧與激情的人們虛位以待。

## 註釋

- 1 Wang Gungwu,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selected Essays*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 Wang Gungwu,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in *Greater China: The Next Superpower?*, ed., David Shambaugh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P, 1995), 274-296.
- 3 David Yen-ho Wu,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d Non-Chinese Identities", *Daedalus* 120, no.2 (spring 1991), 159-179; Ien Ang,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New Formations* 24(winter 1994), 1-18; Allen Chun "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Boundary 2*, 23, no.2 (summer 1996), 111-138; Rey Chow "Introduction: 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 Rethinking a Field*, ed., Rey Chow (Durham & London: Duke UP, 2000), 1-25.
- 4 朱耀偉：〈誰的「中國性」？——九十年代兩岸三地的後殖民研究〉，見《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19期2001年春/夏季號，頁135-58。
- 5 詳可參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及《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6）。
- 6 朱崇科：〈台灣經驗與黃錦樹的馬華文學批評〉，見龔鵬程、楊松年等主編《21世紀台灣、東

- 南亞的文化與文學》（台灣：南洋學社，2002），頁219-39和《吊詭中國性——以黃錦樹個案為中心》，《二十一世紀》待刊稿，共7頁。
- 7 如朱耀偉在〈誰的中國性？〉一文中曾論及其不同特徵：中國大陸：闡釋「中國」的焦慮；台灣：本土的迷思；香港：混雜的邊緣等，參其頁137-44；而黃錦樹則歸納出第四種中國性：馬華文學/文化語境下的表演性，詳可參〈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見氏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93-161。同時林建國的批評與補充（頁163-177對該文的解釋、質疑與推進也別出心裁。
  - 8 Allen Chun, "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131.
  - 9 Rey Chow, "Introduction: 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 5.
  - 10 黃錦樹：《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頁22。
  - 11 黃錦樹：《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頁50。
  - 12 黃錦樹：《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頁57。
  - 13 張錦忠：〈海外存異己：馬華文學朝向「新興華文文學」理論的建立〉，《中外文學》第29卷第4期，2000年9月，頁26。
  - 14 林建國：〈為甚麼馬華文學？〉，《中外文學》第21卷第10期，1993年3月，頁98。
  - 15 黃錦樹：《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頁9。
  - 16 黃錦樹著《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頁17-18。
  - 17 筆者認為，以華人文學取代華文文學，同樣扼殺了他族（非華族）可能精彩的華文書寫，也有其不能完全涵蓋等不如人意之處。
  - 18 張光達：〈九十年代馬華文學（史）觀〉，《人文雜誌》（吉隆坡）2000年3月號，頁114-15。
  - 19 黃錦樹：〈魂在：論中國性的近代起源，其單位、結構及（非）存在論特徵〉，《中外文學》第29卷第2期，2000年7月，頁50-51。
  - 20 相關點評可參朱崇科：〈台灣經驗與黃錦樹的馬華文學批評〉，頁224-225。黃錦樹之原文可參《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頁81-134。
  - 21 具體可參朱崇科：〈吊詭中國性〉和〈台灣經驗與黃錦樹的馬華文學批評〉。
  - 22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186。
  - 23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196。
  - 24 黃錦樹：《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頁19。
  - 25 林建國：〈為甚麼馬華文學？〉，頁105。
  - 26 林建國：〈為甚麼馬華文學？〉，頁114。
  - 27 張錦忠：〈海外存異己：馬華文學朝向「新興華文文學」理論的建立〉，頁22。
  - 28 黃錦樹：《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頁42。
  - 29 林春美：〈近十年來馬華文學的中國情結〉，見王潤華等主編《馬華文學新成就新方向：馬華作品研討與朗讀大會論文集》（新加坡：Unipress，1996），頁15。
  - 30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29卷（上海：世界書局，1936），頁83。
  - 31 王德峰編選：《國性與民德——梁啟超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頁152。
  - 32 筆者曾考察了《星洲日報·現代戲劇》的發展歷程的處以上類似結論，可為佐證。詳可參朱崇科〈艱難的現代性和無奈的本土化〉，《華文文學》（汕頭），2002（4），頁21-27。
  - 33 此處觀點得益於與台灣佛光大學楊師松年教授的會談，在此不敢掠美。
  - 34 林春美：〈近十年來馬華文學的中國情結〉，頁3。

- 35 林春美：〈近十年來馬華文學的中國情結〉，頁3-14。
- 36 林春美：〈近十年來馬華文學的中國情結〉，頁4。
- 37 黃錦樹：〈反思「南洋論述」：華馬文學、複系統與人類學視域〉，《中外文學》第29卷第4期，2000年9月，頁38-37。
- 38 黃錦樹：〈反思「南洋論述」：華馬文學、複系統與人類學視域〉，頁52。
- 39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同窗，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來自印度的何立慧（Hari Hvenkatesan）先生對老舍小說中對康拉德的反抗深表理解和贊同以外，他也提出了老舍的無意識之下的中華文化的優越感：他對馬來人、印度人仍有不同程度的輕視，這無疑是對老舍後殖民視角的進一步修正。
- 40 具體論證可參朱崇科：〈新「新」視角與後殖民解讀——試論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見《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2年1月22日。
- 41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頁139。
- 42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頁138。
- 43 楊乃喬：〈譯者序：從殖民主義到後殖民批評的學緣譜系追溯〉，見穆爾-吉爾伯特（B. J. Moore-Gilbert）等編撰、楊乃喬等譯：《後殖民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15。
- 44 楊乃喬：〈譯者序：從殖民主義到後殖民批評的學緣譜系追溯〉，頁20。
- 45 穆爾-吉爾伯特（B. J. Moore-Gilbert）著，陳仲丹譯：《後殖民理論——語境·實踐·政治》（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6-7。
- 46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頁53。
- 47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頁55。
- 48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頁60。
- 49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頁64。
- 50 朱崇科：〈新「新」視角與後殖民解讀〉。
- 51 一些西方漢學家常常指責當代中國文學「中國性」的缺失，實則體現為另一種東方主義思維的迷思，儘管這種迷思原本出於善意或公理的實際考量（以漢學研究作為一項謀生職業），他們往往希望／預設中國學／化的固態特徵以方便研究或印證他們印象中的中國。
- 52 孫文波：〈中國詩歌的「中國性」〉，全文可參《世紀中國》網站（<http://www.cc.org.cn/wencui/020428200/0204282016.htm>），2002年4月28日上網。
- 53 孫文波：〈中國詩歌的「中國性」〉，《世紀中國》網站。
- 54 簡穆罕默德（Abdul JanMohamed, 1945-）、勞埃德（David Lloyd, 1955-）：〈論少數族話語的理論：目標是甚麼？〉，見吉爾伯特編撰《後殖民批評》，頁338。

朱崇科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作者獲得許可。